

国际移民研究

# 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对策研究<sup>\*</sup>

丘立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关键词] 国际移民; 历史发展趋势; 理论与实践

[摘要] 本文考察世界移民的历史、发展趋势及其理论与实践, 探讨我国的对策。作者认为, 我们应当加强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 从时代的高度和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来认识和处理国际移民问题, 既要坚决反对非法移民, 又要开拓正常渠道支持合法移民, 并给新移民以必要的帮助。

[中图分类号] D52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5)01-0001-16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ts History, Present Situation and China's Related Policy

QIU Li-ben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istorical trends; theories and practice; migration polic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a brief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istory and trends, then examines its theories and practice and discusses the Chinese policy on the issu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we should do more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pproach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and manage it on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for the state policy, the author strongly suggests that while the illegal migration should be dealt with seriously, the state should provide adequate assistance to legal emigrants by opening new channels.

根据联合国人口署《2002年国际移民报告》和国际移民组织(IOM)《2003年世界移民报告》的最新统计, 2000年, 全世界在出生国以外居住一年以上者, 其人数已达到1.75亿人, 约占世界总人口的3%。移民人数比1970年增加了一倍多, 其中女性移民占48%。目前, 全世界移民的60%居住在较发达区域, 40%居住在较不发达区域, 其中欧洲外来移民5600万人, 约占欧洲总人口的7.7%; 北美外来移民4100万人, 约占北美总人口的13%; 澳洲外来移民占其总人口的19.1%; 亚洲外来移民5000万人, 但因亚洲人口众多, 移民只占其总人口的约1%; 非洲外来移民占总人口的2%, 拉丁美洲为1%。较发达地区每10人中有近1人为移民, 发展中国家则每70人中近1人为移民。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是移民输出国就是输入国或过境国, 一些国家三者兼而有之, 完全与移民无关的国家几乎不存在了。由于人口国际迁移涉及错

[收稿日期] 2004-10-17

[作者简介] 丘立本, 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2002-2003年度研究课题《国际移民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移民政策策略研究》研究报告之一。

综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和国际关系等问题，这个问题在许多国家和国际事务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sup>[1]</sup>

国际移民问题已成为 21 世纪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为此，联合国的许多相关机构和欧美国家官方与民间组织的研究机构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工作，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经合组织（OECD）每年都有详细的国际移民年报<sup>[2]</sup>，美国情报部门还就 2000 - 2015 年国际移民的趋势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做了预测。<sup>[3]</sup>相比之下，中国对于国际移民问题的关注则太少。中国有关人口问题的研究机构，主要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对国际移民问题几乎没有顾及。近年来由于出国人数日增，研究中国新移民的文章有所增多，但有关其它国家国际移民的翻译资料和研究成果仍不多见。<sup>[4]</sup>

鉴于此，我们在课题立项时就意识到要从事这项研究工作，首先应对世界各地和国家的国际移民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同时还必须对世界移民的历史和现状、各国的移民政策演变以及国外学术前沿的动态有所研究。考虑到经费有限、时间短促、能力不足等实际情况，我们把研究工作首先放在了解客观情况上，特别是那些近期发生重大变化而我们又不熟悉的地方。为此，我们选择了印度和俄罗斯这两个近年来移民形势变化较大的国家作为国别的研究对象；<sup>[5]</sup>选择了历史上曾是国际移民主要移出地而现在变成主要移入地的欧洲和历史上主要是移入地而今却成为国际移民移出地的拉丁美洲以及华人比较集中的东南亚作为地区的研究对象；<sup>[6]</sup>选择了国际侨汇的新动向作为了解国际移民与移民输出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切入点；<sup>[7]</sup>选择“脑力型移民”以了解人才国际流动的形势。<sup>[8]</sup>此外，我们还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移民的若干特点和相关政策的变化，为研究对策提供必要的国内背景。<sup>[9]</sup>

根据本课题立项时的计划，在国别、区域、专题外还须有一篇总论，分析世界移民历史与现状、理论与政策，并从战略角度研讨对策问题。本文即承担这项任务。

## 一、国际移民历史回顾

在分析世界移民现状、发展趋势和研究对策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世界移民的历史。

人类是一种不断流动和迁移的生物。人类自产生以来就因自然环境变化、人口增长、生产发展、战乱和国家建立等原因而不断地流动和迁移。

现代国际移民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四个时期：

### （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国际移民（1500 - 1800）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下，西班牙殖民者首先在“地理大发现”后，征服了美洲大陆大片土地，建立了世界近代史上第一个殖民大帝国。随后葡萄牙占领巴西全境，建立了面积等于其本土 93 倍的西半球殖民地。荷兰、法国也都先后在北美洲建立了新尼德兰、新法兰西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在 17 世纪也大批侵入北美洲，到 18 世纪 30 年代已在大西洋沿岸建立了 13 个殖民地。

为巩固和扩大其殖民地，掠夺当地资源，为欧洲日益增长的重商主义经济提供原料，欧洲殖民者除了派遣武装人员、行政官吏、传教士外，还需要大量从事生产的劳动力。18 世纪上半叶，殖民地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付不起路费、被迫卖身给殖民地商人或农场主的欧洲契约奴和罪犯。18 世纪中叶以前，白人契约奴约占北美殖民地移民的半数。到 18 世纪下半叶，白人奴隶才逐渐为非洲黑奴所取代。<sup>[10]</sup>

这时期国际移民人数最多的是非洲黑奴。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原住民印地安人的大规模屠杀，导致印地安人人口锐减。为进一步开发美洲殖民地以适应欧洲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殖民者便到非洲掠夺黑奴。据估计，到 1850 年为止，运往美洲的黑奴总数多达 1500 万，为欧洲白人移民的 4 - 5 倍。<sup>[11]</sup>

这一时期国际移民的明显后果是欧洲人在非洲、亚洲尤其是美洲占据了许多地方，为其进一

步对外扩张打下基础，同时大大改变了美洲人口的结构和民族成分，加速了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明朝下半叶至清下半叶（明弘治十三年至清嘉庆五年）。一般认为，中国海外移民在明末清初约有 10 万人，到清道光年间增至 100 万人。对中国海外移民来说，这是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前一阶段，中国海外移民主要还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与朝贡贸易为中心的亚洲市场密切相联系的。但到后一阶段显然已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1511 年葡萄牙占领马六甲，1572 年西班牙将马尼拉作为西属菲律宾首府，1619 年荷兰在巴达维亚建立荷属东印度统治中心，1819 年英国占领新加坡并在此设立自由港。欧洲殖民者以这些战略要地为据点招募和掠夺中国沿海的劳动力，大大加速了中国人口的外流。

## （二）欧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1800 - 1914）

这一时期是世界历史的大变革时期，工业化的进程从欧洲迅速扩展到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资本主义完成了从手工业阶段向大工业的过渡后，紧接着在 19 世纪末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移民呈现出历史上空前的盛况。

最先向美洲新大陆大规模移民的是最早进入工业化高潮的英国。1800 - 1860 年间移居美国的移民中 66 % 来自英国。19 世纪 40 年代末，200 多万爱尔兰人由于饥荒逃往美洲。紧随其后的是德国的移民潮。从 1870 年起大量斯堪的纳维亚和北欧其他地区的移民也加入移民的队伍。1880 年，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掀起更大的移民潮：先是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移民，紧接着是波兰、俄罗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这些“新移民”构成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移民新高潮的主要成分。20 世纪初，欧洲向外移民年均 100 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 150 万人。

据美国社会学家 Massey 的统计，1846 - 1924 年间，总共有 4800 万移民离开欧洲，约为欧洲 1900 年总人口的 12 %，其中英国向外移民占 1900 年英国人口的 41 %，其它欧洲国家依次是挪威 36 %，葡萄牙 30 %，意大利 29 %，西班牙 23 %，瑞典 22 %，丹麦 14 %，瑞士 13 %，芬兰 13 %，奥匈帝国 10 %，德国 8 %，比利时 3 %，俄罗斯和波兰各 2 %，法国 1 %。

在上述 15 个国家中，移民人数超过其 1900 年人口 10 % 的有 10 个，超过 20 % 的有 6 个，最早工业化而处于最先进地位的英国向外移民的人数最多。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大规模向外移民是欧洲工业化时期的普遍现象，它源于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经济的不发展。<sup>[12]</sup>

这一时期，欧洲移民的目的地非常集中，85 % 前往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其中单只美国就吸收了总数的 60 %。<sup>[13]</sup>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亚洲也出现大量人口国际迁移的现象。19 世纪中叶黑人奴隶制取消后，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契约劳工制。这些契约劳工主要被输送到欧洲人的殖民地。根据 Potts 的研究，各殖民强国在 40 个国家内推行过契约劳工制。从 1834 年起到 1941 年这一制度最终在荷属殖民地废除为止，涉及人数多达 1200 - 3700 万人。中国移民在 20 世纪前多为契约劳工，20 世纪后才为自由劳工所取代。<sup>[14]</sup>

## （三）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移民（1914 - 1960）

这一时期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发生了 1914 -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20 世纪 30 年代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和 1937 - 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

一战中断了欧洲向外移民的高潮。战后移民虽一度有所回升，但其规模只及战前的三分之一。1910 - 1914 年，前往美国的东南欧“新移民”占移民总数的五分之四，1921 及 1924 年美国制定了限制移民入境的政策，将东南欧配额降至五分之一，移民人数因之大降。

这一时期，澳大利亚也采取限制移民的措施，致使入境人数降到 1891 年的水平。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口损失惨重的法国（法国在一战中死伤 290 万人）才在 1920 - 1930 年间从国外吸收移民。1931 年流入法国的外国移民总数已达 270 万人，占法国总人口的 6.6 %。不过 1930 年

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得国际移民的人数大大减少了，连法国也对外国移民加以排挤。美国则在其国内加速人口流动，美国历史上从南部招募黑人到北部工业区的所谓“大移民”（great migration）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国际间的移民几乎无法进行了。

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正常的经济移民停止了，而政治性移民则空前增加。一战时德国就曾限制波兰工人离开德国，并以武力征集比利时和俄国占领区的大量劳工。法国、英国也从欧洲和他们的殖民地以及中国征集了近50万劳工为其军事后援，其中中国劳工就有10万人。此外，交战双方都强迫战俘从事劳动。二战中法西斯德国从其占领的国家强行征集了750万外国劳工，其中180万为战俘。1944年德国法西斯垮台前夕，德国工业的四分之一是由外国劳工从事生产的。

二战结束初期，政治性人口迁移主要有：

(1) 270万（欧洲150万、亚洲120万）因战争期间被德、意、日强行迁移的苦役劳工返回祖国；(2) 680万日本士兵和平民从日占区被遣返回国；1200万德国士兵和平民被遣回德国；(3) 1945 - 1948年估计约150万波兰人和犹太人因重新划定国界而迁至苏联，同时又有50万人从苏联迁到波兰；(4) 1951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分治后，印巴双方各有720万人口交换，造成1440万人的国际移民。1951 - 1956年又有150万印度人从巴基斯坦迁回印度，同时又有115万巴基斯坦人从印度迁回巴基斯坦；(5) 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许多西方殖民者被迫回国，其人数约有100万人；(6) 1947 - 1951年，国际组织安置无家可归者100万人。<sup>[15]</sup>

总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经济性移民大大减少，而政治原因造成的人口流动却空前增加。

#### (四) 后工业化时期的国际移民 (1960 - 2004)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移民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移民再也不像工业化时期那样由少数欧洲国家流向少数欧洲人建立的定居地，而是真正具有全球的规模。移民输出国和移民输入国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多了，全球移民的供应地也从欧洲转移到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时代，国际移民是将人们从人口稠密而工业化进程迅速的国家带到人口稀少而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如今后工业时代的移民却是将人们从人口稠密而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引到人口稠密的后工业化社会。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的向外移民在世界移民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而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在向外移民中的份额却显著增加。同时移民目的国的数量和种类也增多了。除了美洲和大洋洲等传统的移民接受国外，整个欧洲现在都在吸收大量外来移民，尤其是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瑞典和荷兰等国。它们在战后初期是从南欧招聘劳工的，后来转而从中东和北非大量招募“客籍劳工”。

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那些长期输出劳工的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也已不再大量输出口，而开始吸收大量外来移民。

1973年随着石油价格的迅速增长，波斯湾许多产油国由于劳工的短缺，也开始吸收外来劳工而成为新的移民目的地。

到了20世纪80年代，除日本之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也开始大量吸收外来劳工移民。

这一时期，传统移民接纳国的移民模式也经历了深刻变化，不仅入境移民急剧增加，而且主要来自劳动力丰富但资金短缺的国家，接受国大都采取限制政策，非法移民因而日益增多。

总之，与工业化时期国际移民的状况相比，后工业时期的国际移民有三点值得人们注意：

一是当代大部分移民来自资本少、劳力多、就业率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人口与经济的失衡现象远比欧洲工业化时期的移民输出国严重得多，因此向外移民的压力也大得多。

二是当代移民接纳国大都是资本和技术密集而土地短缺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由于资本的集中和科技的进步已把许多本地劳动力排除在制造业之外，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虽然这些国家由

于出生率低和老龄化现象严重，仍需大量外来移民的补充，但对于当代发达国家来说，外来移民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大不如前了。在工业化时期，外来移民被视为发展制造业和建立民族国家所必需的重要力量；而在后工业化时期，外来移民除了少数高级人才外，一般只能从事 3D 工作，受到多方的限制。

三是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在财富、收入、实力、发展和文化等方面的差距远比工业化时期大，因为当代移民输出国大都是发展中国家，而工业化时期的移民输出地——欧洲国家却比移民输入地要先进。<sup>[16]</sup>

## 二、21 世纪国际移民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国际人口的流动是特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产物，它与商品、资金、信息在特定地域的流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它的流动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形成若干相对独立的“国际移民体系”（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up>[17]</sup>。在观察 21 世纪国际移民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时，必须首先注意这一结构性的特点。

### （一）五大国际移民体系的形成

美国社会学家 Massey 认为，到 21 世纪初，国际人口迁移已明显形成五大体系，即北美体系、欧洲体系、波斯湾体系、亚太体系和美洲南角体系。

1. 北美移民体系 这是最古老的也是至今仍大量吸收移民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吸收的外来人口数量为加拿大的 5 - 6 倍，虽然按移民与移民输入国人口比，加拿大由于本国人口稀少其相对值比美国大。美国加利福尼亚一个州所吸收的永久性移民就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多。2000 年，美国外来移民已接近 3000 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 11 %。过去这个体系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现在，拉丁美洲的加勒比地区移民约占 45 %，亚洲移民占 36 %，欧洲移民已降至 13 %，非洲、中东和大洋洲移民为数甚少。

2. 欧洲移民体系 欧洲原是移民主要输出地，其移民输入体系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才形成的。1970 年前主要是洲内人口流动即从南欧向西欧流动，20 世纪 70 年代后南欧各国也成为移民输入国。这个体系目前大部分移民来自中东和非洲。其中三分之一来自中东，主要来自土耳其和黎巴嫩；30 %来自非洲，主要出自北非马格里布国家——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国，18 %来自东欧的波兰、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其它国家；来自亚洲的移民较少，只有 10 %左右；来自美洲的则更少。

欧洲移民体系的形成是国际移民史上的新现象，即首次大规模移民从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向人口稠密地区迁移，而这种迁移还出自欧洲主动招募“客工”。欧洲人原本希望“客工”完成任务后，依约返回原籍，但事与愿违，移民反客为主，遂使人口稠密的欧洲成了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

3. 波斯湾移民体系 这个体系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后才形成的。由于石油美元的大量流入和当地劳工严重短缺，中东成了吸收移民的一大新的中心。开始时主要招募中东周边国家的劳工，20 世纪 80 年代转而招募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等亚洲国家的穆斯林，随后又招募越南、韩国、菲律宾等国的非穆斯林劳工。由于输入国不愿外来移民成为永久居民，更不愿意同族、同文、同教的移民介入当地的政治，目前这个体系的移民多为临时工，其中 80 %以上来自亚洲，只有 13 %来自中东各国。

4. 亚太移民体系 这个体系的特点是多中心。目前已形成澳大利亚、日本、东亚和东南亚新兴工业国家与地区四个移民接纳中心。其中澳大利亚的移民也如北美一样，过去以欧洲白人为主，现在则以亚太移民为主。日本从 20 世纪起在吸收亚洲移民的同时也开始大量接纳美洲日裔劳工。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东亚的韩国、台湾地区，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也随着亚

洲经济“奇迹”的出现先后由移民输出地变为移民输入地。就整个亚太体系而言，来自亚洲的移民占 81%，来自美洲和大洋洲的约占 7%，来自中东的只占 4%。

5. 拉美南角移民体系 这个体系中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是古老的移民接纳国，主要接纳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移民，1800 - 1970 年间进入拉丁美洲的 1380 万移民中大约四分之三定居于巴西和阿根廷。二战后来自欧洲的移民锐减，目前以阿根廷为中心的拉美南角移民体系的特点是移民流量少，洲际移民不多，主要来自阿根廷周围国家。据统计，87% 的移民来自拉美，6% 来自欧洲，7% 来自亚洲。<sup>[18]</sup>

除了以上五大移民体系外，Massey 认为，值得注意的还有南非移民体系。本文作者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与历史因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独联体移民体系也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国际移民广泛分布在上述五大移民体系之中，二战前的老移民主要分布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而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则多前往北美、欧洲和澳洲。在研究移民问题时，我们不仅需要注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移民政策的不同，也需要了解同属发达国家的北美和欧洲移民政策的差异，因为两者属于不同的移民体系，对待外来移民的态度和政策是极不相同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未来可能会因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下降而不得不输入劳动力，形成新的移民体系。这虽是本世纪下半叶的事情，但也值得认真考虑。<sup>[19]</sup>

## （二）移民模式复杂化与界线的模糊，流动方式的多样化与跨国社群的形成

现代国际人口迁移既是全球化的要素也是其历史进程的产物，在全球化的不同历史阶段，国际人口迁移自然显现出其时代特点。

英国学者斯蒂芬·卡斯尔斯 (Stephen Castles) 认为，21 世纪是全球化进程空前加速的时代，新的交通工具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资金、商品、信息、文化产物以及人员有可能通过政府间的官方网络、跨国公司、各种非政府民间跨国机构甚至跨国犯罪集团频繁流动。在此背景下，21 世纪国际人口流动过程中最有时代特色并对今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有两点：

一是移民模式的多样化与不同类别移民间的界线日趋模糊。政府虽极力鼓励某种移民入境同时限制某种移民入境，但发现很难将其加以区别，因而无法实施其政策。

二是现代信息与交通技术快速发展，人口跨国流动日趋经常化，临时性移民 (temporary migration)、往返性移民和巡回性移民 (repeated and circulatory migration) 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移民通过各种网络，生活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会，形成跨国社会 (transnational community)，并产生强烈的跨国主义意识 (transnationalism)。过去，国际人口迁移是在两国之间进行的，他们或者成为永久居民，逐步汇入主流社会；或者只是暂时的劳工和侨民，与母国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的主权和权力都没有受到怀疑。但在全球化加速的今天，随着跨国社会的普遍出现和跨国主义意识的增强，多重认同 (multiple identities)、多层公民权 (multi-layered citizenship) 和双重国籍 (dual nationality) 等问题应运而生，国家主权问题受到严峻的挑战。

国际人口迁移模式的复杂化与类别的模糊化，人口流动方式的经常化、多样化和跨国社会的普遍化以及对国家主权构成的严峻挑战，是新世纪国际移民的重要特点，也是今后发展的重要趋势。一些从全球化发展逻辑出发考察国际移民问题，并把迁移模式与定居模式统一起来思考的学者，特别指出这一趋势的意义。但目前，学术界和政府官员大部分人对当代国际移民发展趋势的分析与判断，主要放在移民数量的增长和非法移民的问题上。

## （三）国际移民数量的增长与非法移民问题的日趋严重

国际移民组织 (IOM) 的资料指出，近 40 年来国际移民的数量有了很大增长。1965 年，全球国际移民只有 750 万，而 2000 年已增至 1.75 亿，约为世界总人口的 3%；全球每 35 人中有 1 人为跨国移民。虽然国际移民在全球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但其增长速度却比全球总人口的增

长速度快。预计到 2050 年可达到 2.3 亿人。但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国际移民以 1985 - 1990 年的速度即年均 2.59 % 增长，那么，2050 年其数量很可能达到 5.39 亿，为现在的 3 倍以上。<sup>[21]</sup>

国际移民人数将大为增长，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全球化拉大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加深了南北之间的鸿沟。2000 年，全球 GDP 为 30 万亿美元，按总人口 60 亿算，人均收入为 5000 美元。但实际上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人均收入相差甚大，瑞士人均收入为 3.8 万美元，而埃塞俄比亚才 100 美元。1975 年，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是中等收入国家的 8 倍、低收入国家的 41 倍；而到了 2000 年，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是中等收入国家的 16 倍、低收入国家的 66 倍。许多贫困国家的人们为逃避贫困、自然灾害和战乱，寻求安全和出路必然要千方百计向发达国家移民。<sup>[22]</sup>

二是经济发达国家生育率大幅下降，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日趋严重，劳动力极度缺乏；而发展中国家人口正处于高增长期，劳动力大量过剩。现在，全球每年人口增加 8300 万，其中 8200 万是在发展中国家出生；每年大约有 230 万移民到达西方国家，占西方国家人口增长的三分之二。有学者指出，1800 年，欧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 20 %，而非洲人口占全球人口的 8 %；现在，欧洲和非洲人口大体相当；但到 2050 年，欧洲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比例将降到 7 %，而非洲的比例则升至 20 %。高出生率必然带来移民的压力。<sup>[23]</sup>

三是交通与信息业的革命为跨国移民提供了愈来愈便利的条件。不但人员来往增多，而且运费便宜。现在，合法移民只要花上 2500 美元便可到达世界各地，非法移民也只要花 1 - 2 万美元便可到达目的地。<sup>[24]</sup>

四是全球化过程中各种官方与民间网络的发展也为人口跨国迁移提供了渠道和机制。移民网络的形成扩大了移民信息来源，降低了移居成本和风险，使整个移民过程获得内在动力。而移民产业的兴起更促进了移民数量的增加。<sup>[25]</sup>

随着移民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强边界管制并对外来移民加以限制。25 年前只有 6 % 的国家制定限制移民的政策，如今这类国家已增至 40 %。现在只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和英国等少数国家采取鼓励永久性移民的政策，而这些国家对外来移民的接纳也是有选择的，他们竭力吸收高科技专业人才和熟练劳动力，而严格限制非熟练劳动力、难民和寻求避难者的进入。各国加强对边境的控制和对移民的限制，导致非法移民日趋增多。据欧盟估计，1990 年欧洲非法移民约 200 万人，2001 年增至 300 万人，现在每年以 50 万人的速度增长。美国情报部门预测，2000 - 2015 年间，发展中国家每年将有 4500 万人进入劳动市场，其中将有不少人因无法在国内就业而流向国外，在各类国际移民中增加最快的将是非法移民。该预测指出，20 年前进入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只占移民总数的 20 %，如今已占了新移民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现在美国每年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逮捕的非法入境者多达 150 万人。2000 年滞留美国的非法移民总数已多达 900 万至 1100 万，几乎是原先估计的两倍。<sup>[26]</sup>如何应对非法移民日益增长的问题已成为国际性的难题。

### 三、国际移民理论与移民政策的变化

#### （一）国际移民理论发展的轨迹

国际移民作为全球化的要素和产物，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和趋势。那么，反映这一客观进程的国际移民理论以及受到这些理论影响的移民政策又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这也是研究对策时不能不了解的问题。

现代移民研究的奠基人、英国地理学家莱文斯坦 (E. G. Ravenstein)，虽然在 1885 - 1889 年间发表的《移民的规律》(The Laws of migration) 中提出了移民的十一条“规律”，但这些“规律”实际上只是对 19 世纪欧洲移民状况的描述和梳理，尚未达到理论的高度。真正称得上移民理论

的是二战后出现的“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研究成果。<sup>[27]</sup>

1. 新古典主义学派移民理论 (Neoclassical Economics Migration Theory) 此论直接脱胎于 W. 阿瑟·刘易斯的“双重经济”和“均衡模型”。此论认为, 国际移民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 是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 其根源在于国家间的工资差距, 而人口流动可以消除这种差距并最终促使移民现象消失。此派理论所依据的是人们所熟悉的一些概念如“合理选择”、“预期净收益”、“工资差”等, 其理论模型简明、精当, 易为人们所接受, 1975 年前在学术界占居支配地位。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后, 全球化进程加速, 国际移民出现许多新模式和新特点, 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理论已无法加以解释, 受到多方面的挑战。新经济学移民理论就是来自其内部的批评和修补。<sup>[28]</sup>

2. 新经济学移民理论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 Theory) 代表人物奥德斯塔克 (Oded Stark) 认为, 移民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家庭, 移民的目的也不全在于高工资, 更重要的是为了降低风险, 寻求多种生财之道。也就是说, 决定移民的不单有劳动力市场, 还有保险市场、资本市场等。因此, 存在国家间的工资差距, 移民未必发生, 没有工资差距, 移民未必不会发生。新经济学移民理论只从移民输出国一方说明移民的原因, 输入国的情况如何并未加以说明, 因此出现了输入国“劳工市场分割”的理论。<sup>[29]</sup>

3. 劳工市场分割论 (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 也称“双重劳动市场论”, 此学派代表人物迈克尔·皮奥里 (Michael Piore) 认为, 随着工业化的进展, 发达国家出现了资本密集型的高效高收入部门和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效低收入部门, 导致双重劳动市场的出现。由于当地居民不愿进入低效低收入劳动市场因而不得不靠外来移民填补空缺。外来移民已成为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的结构性需求。<sup>[30]</sup>

4. 世界体系理论 (World Systems Theory) 此论认为, 国际移民的产生不仅是发达国家内部的需要, 也是不发达国家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结果。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促成商品、资本、信息以及劳动力的全球流动, 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使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为发达国家的掠夺对象。<sup>[31]</sup>世界体系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从全球范围研究移民问题的宏观框架, 但它未能解释为何在同一框架下各国移民状况差别巨大。网络说和累积效应说力图填补这一空白。

5. 网络说 (Migration Network) 与累积效应说 (Cumulative Causation) 此论认为, 网络是实现移民的重要中介, 也是一种社会资本, 能大大降低移民的成本和风险。移民网络的存在与否对各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状况影响甚大。移民网络一旦形成便具有“乘法效应”, 并使移民过程获得自行发展的内在机制, 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sup>[32]</sup>

6. 移民系统理论 (Migration Systems Theory) 此论认为, 国际人口流动不仅是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 也是特定政治、文化和历史的产物, 它的流动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形成若干相对独立的“国际移民体系”, 必须研究移民输出国与输入国两端间此前复杂的各种关系, 才能深入揭示移民的具体原因与特点。例如牙买加移民多到英国, 马提尼克岛移民到法国, 苏里南移民则到荷兰, 阿尔及利亚移民到法国, 等等, 都与此前殖民统治所形成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紧密关联。<sup>[33]</sup>

除了以上这些理论外, 还有力图将人口变化的规律和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观察国际移民的“转型论” (Transition Theory) 和“后现代观” (Postmodernist View) 等。<sup>[34]</sup>

上述移民理论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范式, 即: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均衡”范式、历史结构主义范式和自主实践范式。三种范式的发展轨迹表明, 随着二战后, 特别是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国际移民数量、模式、性质的急剧变化, 移民理论也经历了深刻变化。人们观察移民问题的视角已从个体扩大到家庭、社区, 从输入国、输出国扩展到全球; 研究问题的层面也从经济基础到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 从微观、宏观发展到作为两者中介的中观; 而研



究方法也从原来的单学科如地理学、经济学，发展到多学科如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虽然上述各种移民理论还不能单独完满说明国际移民的产生和持续等问题，但若把三种范式结合起来考虑，人们对移民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认识无疑是比过去深刻多了。当前，国际移民理论总的说来虽还很不完善，许多重大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但我们在研究国际移民问题时，若不追踪这一理论演进的轨迹，不了解近三十年来理论界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还在重复三十多年前一度盛行而现在早已过时的“推拉论”，恐怕难以取得科学的成果。<sup>[35]</sup>

## （二）国际移民政策的检讨

移民理论家在研究复杂的移民问题时通常容易忽视政治因素的影响<sup>[36]</sup>。新古典主义学派甚至认为国家的干预只能扭曲“移民市场”，带来消极的后果。其实，完全离开国家的控制，纯粹由市场决定的移民是不存在的。重商主义时期，欧洲的君主们视人口为其财富，禁止人民随意离开国土。19世纪20年代工业化的英国，在大量输出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也严禁法国、俄罗斯、德国和美国的业主招募其技术工人，而美洲黑奴的使用及其后的契约劳工制的推广更是借助于殖民主义政权的力量。欧洲移民大潮涌向新大陆时美国也不是毫无选择地接受的。1880年美国就公然立法限制亚裔入境，随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相继仿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加、澳等传统移民输入国政策的变化对国际移民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当今跨国主义的出现固然是对主权国家的挑战，但跨国主义本身是以主权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忽视政治因素是无法解释国际移民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与学术界的情况相反，移民政策制定者和执行官员多迷信政策的力量而轻视人口国际迁移的客观规律。他们以为对待移民可以像摆弄水龙头开关一样随意开关国门。许多发达国家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制定移民政策的，完全不顾移民和移民输出国的利益。不过这些政策并非都能如愿以偿。例如，澳大利亚立国后推行“白澳”政策，二战后又竭力鼓吹同化政策。但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欧洲移民锐减，亚裔增多，“白澳”政策和同化政策均告破产，从1973年起不得不实行多元文化政策（multiculturalism）。又如，战后德国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从南欧和土耳其输入1000多万“客籍移民”，规定这些移民不得携带家属入境，须在合同期满后回国，但1973年石油危机后政府却无法将大部分期满的移民遣送回去。如今德国不得不承认这些移民的居住权和少数民族地位，并于1999年通过新国籍法，放弃血统主义原则；2004年7月又通过首部移民法，承认德国为移民国家。美国战后移民政策的后果也是制定者始料不及的。美国1965年新移民法原本期望能吸引较多的欧洲移民来抵御非白人移民的“威胁”，但结果适得其反，亚裔和拉丁裔移民占了80%以上，给了美国社会巨大的冲击。“大熔炉”的政策推行不下去了，只得实行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欧洲移民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从鼓励劳工进口转为限制移民进口，推行所谓“堡垒政策”，严堵非法移民入境。美国也从大量吸收永久性移民转为重点对付非法移民。但是欧美国家这些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非法移民越来越多就是证明。<sup>[37]</sup>为此，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现行移民政策进行反思和检讨。

英国学者 Stephen Castle 认为，欧美国家在制定移民政策和预测其政策前景上的失败，不是因为国力不强政策推行不下去，而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忽视了千百万移民及其家庭改善自身处境的自主力量（migrant agency），不懂得国际移民有其自身内在的机制和动力，经历了长期的演进过程。他们只顾短期效应，缺乏长远的目光。<sup>[37]</sup>

美国学者 Douglas Massey 认为，国际移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由于国家间工资的差别引起的，事实上它是在多种市场的作用下，回应工业化社会内在结构性的需求，并在世界体系框架内利用网络所提供的社会资本运作的。发达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一般民众，深受新古典主义移民理论的影响，不了解新经济学移民论、劳工市场分割论、世界体系论和社会资本论等新的研

究成果，不懂得问题的复杂性，企图用堵的办法来对付移民，以为只要采取严厉的办法打击非法移民，使其得不偿失，无利可图，就能解决问题，这是移民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

Massey 认为，移民政策的制定者必须明白下列基本事实才能避免重大失误：(1) 国际移民不是由于经济不发展造成的，它是经济发展自身的产物；(2) 国际移民是社会、政治、经济跨越国境广泛整合过程的结果，不是移民个人随意的行为；(3) 移民进入发达国家是回应了后工业化国家结构性强烈持续的需求；(4) 移民初到发达国家时为的是解决自己家庭的经济问题并无久留意；(5) 移民出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市场因素的影响，不只是劳工市场的影响；(6) 移民在国外取得经验后，其动机会发生变化，通常先要求延长居留时间，随后才决定定居；(7) 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会在居留地建立起自己的网络和维持生存的社会基础设施，从而获得发展的内在动力；(8) 移民潮不是永无止境的，它的生命周期可长可短，经过一个“移民峰”后便会逐渐消失下去。<sup>[38]</sup>

美国学者 Philip L. Martin 认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移民只有通过积极的国际合作与协商才能制定出有效的可持续的移民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照顾移民与顾主的利益、移民输出国和输入国的利益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利益，做到利益共享才可能达到目的。<sup>[39]</sup>

学者们对移民政策的反思与检讨，发人深省。它提醒我们，导致国际移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问题十分复杂，制定国际移民政策时，必须花大力气，深入调研，吸收国际最新科研成果，努力掌握移民活动的规律，尊重移民的自主精神，并从长远看问题。

#### 四、对策研究

关于对策研究，单就中国国际移民某一具体问题的对策研究，如对外劳务输出的对策研究、留学生与人才对策研究、华人经济和华文教育的对策研究等较为多见，而就中国国际移民的总体对策研究却难得一见。因此我们想就战略性问题提点看法，欢迎批评指正。

##### (一) 从时代的高度认识国际移民问题

上面我们已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方面简要介绍了国际移民的基本情况。从国际移民的客观历史进程和人们对这一进程的主观认识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点：一是现代国际移民和古代移民有着根本的不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古代的移民是“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生产力不够发展”所致，而现代的移民则完全相反，是生产力增长的结果。<sup>[40]</sup> 现代国际移民从根本上说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同时也是经济全球化的要素；二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进程空前迅猛发展的时代，也是国际移民全新发展的时代。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视角来观察国际移民问题，从新时代的高度认识国际移民问题。

请看下列统计数字：2000 年全球货物贸易额达到 13 万亿美元，比 1950 年增长了 17 倍，相当于全球 GDP 的 40 %。<sup>[41]</sup> 国际金融交易的扩张速度远远超过贸易的发展速度，2000 年资本交易总值达到 83 万亿美元，比 1980 年增加 15.6 倍。2000 年全球资本市场流量达到 43240 亿美元，比 1991 年增长 4.4 倍。2000 年外国直接投资 (FDI) 达到 11180 亿美元，而 1991 年为 1600 亿美元。同期，全球净私人直接投资年率已经超过全球 GDP 和国际贸易的年增长率<sup>[42]</sup>。

全球经济如此高速发展，必然促进政治、文化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入，进一步带动了移民人数的增长和移民模式、流向、性质的深刻变化，给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空前严峻的挑战。我们看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并没有根本改变，南北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全球范围内偷渡和贩卖人口等跨国犯罪的非法移民问题日益突出，给各国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国家关系带来严重的后果，因而引起了国际社会严重的关注。如何有效把握全球化迅猛发展所提供的机遇，同时解决由于移民而产生的种种难题，从而趋利避害，这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类面临的艰巨任务。

## (二) 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处理国际移民问题

我国是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正处在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据官方刊物报道，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30 多年来中国已少生了 3 亿人口。2001 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 6.95‰，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1.22，不但大大低于 2.1 的人口更替水平，也低于日本和韩国。虽然如此，由于人口的基数大，中国人口仍在增长，每年新生儿 1700 多万，估计要到本世纪 30 年代中期才停止增长，峰值达到 14.5 亿人左右；也有人估计将达到 16 亿。2001 年底中国城乡就业人员 7.3 亿，比发达国家就业人口的 4.3 亿还多出 3 亿。现在每年净增劳动力近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 2 亿多。中国劳动力总供给大大超过总需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sup>[43]</sup>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人口稠密的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城市尚无能力吸收大量离开土地的农民，因而都出现人口大量外流现象。待到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国内就业机会增加，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之后，这种现象才逐渐消失。

1846 - 1924 年间，欧洲在工业化进程中就曾向外输出 4800 万移民，约为欧洲 1900 年总人口的 12%，欧洲移民潮由低到高再转低的过程，即所谓“移民峰”(migration hump)的时间，大约持续了 80 - 90 年，战后的韩国则用了 40 年。<sup>[44]</sup>据 Henrik Olesen 等人对战后国际移民的研究，“移民峰”的起点约在人均收入 1500 美元左右，而终点则约为 8000 美元。人均收入 1500 美元以下的穷国，由于太穷，支付不了出国费用，多为难民，甚少自由移民；人均 1500 美元至 8000 美元之间的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条件较好，出现大量自由移民；人均收入超过 8000 美元以上的富裕国家，因为太富，已没有向外移民的必要。<sup>[45]</sup>

我国全国人均收入刚刚达到 1000 美元，但沿海许多省市人均收入已超过 1500 美元，那里已开始出国热。从 Henrik Olesen 等人的研究看，中国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难免要出现国际移民大潮，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至于“移民峰”有多长，现在还很难说。有的学者认为，由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育龄妇女的生育已大大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再加上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中国的“移民峰”不会太长，用不了几十年就会由移民输出国变为输入国<sup>[46]</sup>。

中国国际移民潮的出现，不仅对移民本身实现自由择业，改善家庭经济状况颇有好处，而且对于缓解国内就业的紧张形势，发挥人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参与人力资源的全球配置，增加侨汇收入，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人才素质，壮大华侨队伍，拓展华人经济网络，促进中外贸易的发展和东西文化的交流等也都很有好处。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作为移民个人的私事来对待，而应当作为国家的大事来考虑。

中国人口向外流动，正如世界各国一样，是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堵是堵不住的，只能顺应这种历史趋势，趋利避害，加以引导。大家知道，欧洲的工业化是在许多人口只有数千万的国家中进行的，这些国家的外流人口占本国人口的比例虽然不小，但绝对数额并不大。中国的工业化是在一个 13 亿人口的国家中进行的，中国人口中 1% 的人向外移民就是 1300 万，10% 就是 1.3 亿。不难想象，如果中国也像欧洲国家当时那样，推行“自由主义”的移民政策，听任人口外流，会带给世界何等巨大的冲击？由此而引发的族群矛盾、国际纷争又将怎样妨碍中国和平发展国策的实施？中国是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主要依靠加速城市化进程来吸纳农村释放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当然，我们也要发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人力资源的全球配置。如何做到既顺应历史潮流又不放任自流，既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移民自身的需求又不至于对世界造成严重冲击，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极大的难题，急待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总之，不论从抓住机遇的角度还是从应对挑战的角度，我们都不能不把中国国际移民的问题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来研究和处理。

## (三) 积极开拓正常的移民渠道，坚决反对非法移民

考虑未来无序移民可能出现的严重局面，为的是防范于未然，但当前的问题还不是中国对外

移民多了，而是少了。

据最新统计，中国现有海外移民约 3300 万。<sup>[47]</sup>这个数字是指鸦片战争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及其后裔的现有存量，而不是指最近二三十年移民的数量。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近 30 年中，华人移民的总量一般估计超不过 500 万，其中大陆移民估计不过 250 万，其他为港澳台移民和东南亚等国家的华人再移民。

中国人常以海水到处都有华人而感到自豪，以为中国的海外移民是世界第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人在海外够多了，不宜再提对外移民，免得授人以柄，引来麻烦。这种想法值得商榷。

据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估计，欧洲当时的人口约为 7 亿，而欧洲人及其后裔生活在欧洲以外的人数约为 3.5 亿，约为欧洲总人口的 50%；非洲当时的总人口约为 5.4 亿，而生活在非洲以外的非洲人及其后裔约为 3 亿，与非洲总人口的比超过 50%。<sup>[48]</sup>爱尔兰现有人口 357 万，其侨民也有 300 多万，而具有爱尔兰血统的人多达 5000 万（其中美国约 4000 万，澳大利亚 540 万，英国 100 万，新西兰 54 万）。<sup>[49]</sup>意大利现有人口 5719 万，1861 - 1965 年间对外移民达到 2750 万，其移民与后裔约有 5000 万，为意大利国内总人口的 87%；<sup>[50]</sup>法国是欧洲最早的人口净输入国，现有人口 5817 万，其国外移民及其后裔也多达 2200 万（其中加拿大 700 万，美国 1400 万），为国内总人口的 37%<sup>[51]</sup>。中国拥有 13 亿人口，目前海外华侨与华人的数量还达不到 3400 万，中国海外移民及其后裔与国内总人口之比，只有约 2.7% 而已。中国海外移民的绝对数量并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老子天下第一，而相对于人口的比值我们又比许多西方国家少得多。

我们不应夜郎自大，更不应自己吓唬自己，应该积极主动地开拓正常的移民渠道，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参与人力资源的全球配置，缓解国内部分就业的压力。

有人说，“不是不想出去，是出不去，19 世纪的欧洲人四处建立殖民地，爱到哪里就到哪里，如入无人之地，现在时代不同了，没那么容易出去。”

时代确实不同了，旧殖民统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受限制地向外移民是不可能了，但是，曾有 5000 万移民像潮水般涌向世界各地的欧洲，如今却因生育率低下、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而不得不每年输入大量劳工。目前欧洲外来移民大约 2000 万人，其中非法移民约 300 万人，非法移民的数量每年以 50 万人的速度增长。据联合国统计，欧盟在 2050 年前至少需要引进 4400 万劳力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sup>[52]</sup>而俄罗斯由于出生率低，死亡率比欧洲发达国家高数倍，如无有效措施，人口可能从 2001 年的 1.43 亿降至 2050 年的 8000 万，目前正急于引进高质量的劳动力；<sup>[53]</sup>目前全球每年流动劳力有 2500 - 3000 万人，而我国劳务出口最多也只有 35 万人，仅占 1% 左右。<sup>[54]</sup>

时代确实不同了，但新的时代有新的机遇、新的移民方式和途径。如果说 19 世纪是欧洲移民的时代。那么 21 世纪就是世界移民的时代，2000 年全球有 1.75 亿人为离开本国到世界各地谋生的移民，为什么人家出得去，偏偏我们中国人出不去呢？

问题恐怕出在我们自己的观念和体制上。我们对全球化时代的特点还不了解，根本就没有把国际移民问题提升到全球化时代的高度去认识，也没有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上去思考。改革开放前，我们把对外移民的问题政治化，严加限制，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放宽限制，成为公民个人自由抉择的事情。这当然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如前所述，国际移民并不仅仅是移民个人的私事，也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事，国家完全不管也是不行的。国家应当建立移民机构，加快对外劳务合作与移民的立法，责成有关机构认真研究国际移民流动的规律，借鉴国际经验，掌握国际移民的动向，分析国际劳动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并及时向公众通报，以便具备移民条件者抉择。国家应主动开拓海外劳务市场，积极拓宽正常移民的渠道，加强劳务培训，帮助移民更好地了解海外的情况，以适应新的环境。此外，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海外移民。

长期以来我们把劳务和移民严格加以区别，这是和我们在计划经济模式下控制人力的思维相

关的，但在市场经济模式下，劳务属于临时性移民，是劳工移民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与其它移民形式一样，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其界线也是日趋模糊的。因此，我们在概念运用与理解上应与国际上相一致。

非法移民是当前国际移民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只谈三点：

1. 中国的非法移民不多，在当今全球非法移民中所占比例很小，国际媒体之所以在“金色冒险号事件”和“多佛尔惨案”上大加炒作，搞得沸沸扬扬，仿佛中国移民都是非法移民，正如著名的英国移民学家 Ronald Skeldon 在“中国非法移民的神话与现实”一文中所说，是出于“对中国这个人口最多国家未来巨大的移民潜力的恐惧”。<sup>[55]</sup>

2. 中国的非法移民虽然数量不多，但我国政府反对非法移民的态度是鲜明的，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分子的行动是坚决的。这是完全正确的。非法移民扰乱移民输入国和中转国的社会治安和秩序，影响国与国之间正常的经贸活动和人员交往，如果我们对非法移民问题态度暧昧，对犯罪分子手软，试问周边国家大量非法移民的入境如何对付？中国现在还不富裕，但截止 2000 年底，中国警方已查获非法入境、居留、就业的外籍人员达 8.5 万人次。相信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外来人口必然增多，没有明确一贯的政策，将何以应对非法移民的不同的严峻挑战？

当然，态度鲜明，行动坚决，不等于不做细致的工作，要分清非法移民的组织者和犯罪集团的头目和一般非法移民的不同。对于前者要依法严加惩处，而对于非法移民，在依法处理之后还应给予人道主义的帮助，因为他们既是违法者又是受害者。

顺便提一下，国际上对我们统称的“非法移民”一语，有许多不同的用词，如 *illegal migration*（非法移民）、*irregular migration*（不合规则的移民）、*undocumented migration*（无正式文件的移民）、*unauthorized migration*（未经许可的移民）等。这些词在词义上和法义上略有差别，反映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移民的着眼点和政策的微妙差异，从工作细致上说，似应加以辨别。

3. 反对非法移民最有效的办法是开拓合法移民的渠道，我国政府已经和包括欧盟在内的 40 多个国家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开展合作，并与欧盟委员会举行多次不同级别的磋商，同时在国内开展严厉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但是，我国政府与欧美发达国家在开展合法移民和劳务合作方面似乎并未取得明显的进展，据说欧美的劳务市场至今还未对我们正式开放，这是中国在国际劳务市场上占据很小份额的重要原因。我们应当把承诺打击非法移民与要求开放劳动市场联系起来，据理力争，获取正常移民与劳务份额，反对在移民问题上的歧视政策。与此同时，还应认真研究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有关“自然人流动”的条款，为国人争取更多的海外就业机会。<sup>[56]</sup>

**（四）开阔视野，更新观念，从国际移民角度看待侨务，给对外移民以必要的帮助**

华侨华人是中国国际移民的产物，没有国际移民也就没有华侨和华人，这是常识。但长期以来我们却违反常识，将同一事物切成两段，把移民与侨民工作人为地割裂开来，管移民的不管侨民，管侨民的不管移民，河水不犯井水，各自为政，结果是华侨华人问题成了无源之水，侨务工作事倍功半，移民工作也不好做。是彻底抛弃这种陈旧观念和体制的时候了。

华侨华人是中国国际移民的产物，而中国国际移民又是世界国际移民的一部分，要真正认识中国国际移民，就必须了解世界国际移民的整体情况，只有认识世界才能真正认识自我。侨务工作者要开阔视野，更新观念，从国际移民的角度认识华侨华人问题，拓宽侨务工作的空间。

如前所述，根据国际移民的经验，今后的二三十年，中国难免会出现移民潮。对这股移民潮不能堵，只能趋利避害，加以引导。这项任务虽然十分艰巨，但对国家却有大利，因为对外移民可以缓解国内就业的紧张形势，发挥人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参与人力资源的全球配置，增加侨汇收入，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人才素质，壮大华侨队伍，拓展华人经济网络，促进

中外贸易的发展和东西文化的交流。既然如此，“五侨”这支队伍，除了努力引进华人资金、技术、人才之外，是不是可以做点工作来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移民的工作呢？比如说，通过华人网络帮助了解国际劳工市场的需要和动向，获取合法移民的途径；发挥归侨懂得当地语言的优势，帮助开展语言培训；利用归侨熟悉国外情况的特点，帮助移民顺利进入原居地；通过华侨华人社会网络，帮助新移民度过人生最困难的时刻，促进新旧移民的互助与团结等。总之，引进华人资金、技术、人才是为了支持国家建设，帮助人们顺利地实现国际迁移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这样做，对侨务工作本身有三点好处：一是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提供源头活水，输送新鲜血液，有助于侨务资源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和利用。光取蛋，不养鸡，难以为继；二是有所取必有所予，才能让华侨体会到祖国的关怀。一味地要求华侨华人奉献，难得侨心；三是移民初到异域，人地生疏，无依无靠，是人生中最艰难曲折的一段经历，祖国亲人的支持，最能激起游子的爱国心；海外创业，功成名就者毕竟是少数，多数人是辛勤平凡的劳动者，帮助新移民的工作可以惠及移民的多数，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政策。只为少数投资者服务，必失去大多数华侨华人的真心支持。总之，能否开阔眼界，从国际移民的角度看待侨务工作，这是能否真正贯彻党的科学发展观，做到求真务实的大问题。

### （五）加强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

鉴于过去对国际移民问题重视不够，研究基础比较薄弱，而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又很多，国家应选择重点院校或科研机构，集中人力物力，建立有独立编制的国际移民研究中心，加强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与此同时，鼓励现有的人口研究单位在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同时开展国际人口迁移的研究。<sup>[57]</sup>国际移民的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应正式纳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之内并作为新兴学科给予大力扶持。

国外研究国际移民的机构甚多，除联合国和国际移民组织外，还有许多政府和民间团体设立的专门研究国际移民的学术机构，我们应主动与他们取得联系，开展学术交流，了解最新动态，吸收科学成果。在条件具备时，还可与国外学术机构开展联合研究，共享研究成果。

国际移民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历史、法律等问题，必须开展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华侨华人是中国人人口国际迁移的产物，华侨华人问题的深入研究，离不开国际移民的研究，这两个方面尤其应当加强联系，密切合作。<sup>[58]</sup>

研究工作要给予实际工作有力的支持，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为此，必须与外交部、公安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商业部、文化部等实际工作单位加强联系，了解现实的需要，倾听实践的呼声。目前许多部门都设有自己的部门研究机构，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属下的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商业部属下的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等。他们的研究涉及劳务输出、华侨华人经济等问题，应加强联系，及时交换科研成果，促进科研单位与实际工作部门间的联系。

### 〔注释〕

-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0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The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03*.
- [2] OECD: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nual Report*, SOPEMI. 该年度移民报告至 2001 年已出版 26 集。
- [3]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Growing Global Migr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NIE 2001 - O2D 2001.
- [4] 这方面的最新译著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国际移民 2000》，第 18 卷第 3 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2001 年 8 月；高伟浓等著：《国际移民环境下的中国新移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年。
- [5] 张秀明：《海外印度移民及印度政府的有关政策——兼与中国侨务政策的比较》（本课题研究报告之五）；邓兰华、张红：《俄罗斯华侨华人与俄联邦的移民政策》（本课题研究报告之六）。
- [6] 王春光：《欧盟移民政策与中国移民的前景》（本课题研究报告之七）；丘立本：《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国

际移民——从主要移民输入地到主要移民输出地》(本课题研究报告之八);曾少聪:《东南亚国际移民与种族民族问题》(本课题研究报告之四)。

- [7] 丘立本:《国际侨汇新动向与我国侨汇政策》(本课题研究报告之九)。
- [8] 程希:《“脑力型移民”与“体力型移民”——迁移的全球化与知识的地缘政治学》(本课题研究报告之十)。
- [9] 赵红英:《关于大陆新移民及相关政策的若干思考》(本课题研究报告之二);曹善玉:《改革开放后东北三省朝鲜族海外移民问题初探》(本课题研究报告之三)。
- [10] 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页;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 [11] R. T. Appleyar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allenge for the Nineties*. Geneva, IOM, 1991.
- [12] [18] Douglas S. Massey,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2003.
- [13] Dougla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p. 1 - 2.
- [14] Potts L. *The World Labour Market: A History of Migration*. London, 1990, pp. 63 - 108.
- [15] 参见邬沧萍主编:《世界人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45 - 346页。
- [16] Douglas S. Massey et al, *Worlds in Motion*. 1998, pp. 6 - 7.
- [17] [33] M. M. Kritz, L. L. Lim, and H. (eds) Zlotnik,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 A Global Approach*. Oxford, 1992.
- [19] [46] Ronald Skeldon,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End of Exceptionalism. 2003. <http://192.38.121.218/isscov/documents/skeldonkeynote.doc>.
- [20] Stephen Castles,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Form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Globalization*. 2001, <http://www.unesco.org/most/apmrcast.htm>
- [21] Rita Suessmuth, *Migration in Transatlantic Perspective: Common Concerns - Different Views*. 2003.
- [22] Philip Martin, *Copenhagen Consensus: Challenge Paper on Population Migration*. 2004, p. 11.
- [23] Philip Martin, *Sustainable Migration Policie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Geneva, 2003.
- [24] Philip Martin, *Copenhagen Consensus: Challenge Paper on Population Migration*. 2004, p. 13.
- [25] [37] Stephen Castles, *The Factors that Make and Unmake Migration Policies*. 2003, CMD Working Paper # 03 - 09a.
- [27] Ronald Skeld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Global Perspective*. 1997, p. 19.
- [28] Arthur W.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54, 22: 139 - 191; Larry A. Sjaastad, The Costs and Returns of Human Migr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705. pp. 80 - 93.
- [29] Oded Stark,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A Review Articl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4, 14: pp. 251 - 259.
- [30] Michael Piore, *Birds of Passage: Migrant Labor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31] Saskia Sassen,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Flo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32] Dougla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and J. Edward Taylor,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1998.
- [34] Ronald Skeld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Global Perspective*. Longman. 1997, p. 17 - 40.
- [35] Douglas S. Massey, Joaquin Arango, Graeme Hugo, Ali Kouaouci, Adela Pellegrino, J. Edward Taylo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Review and Appraisal. In Robin Cohen (eds), *Theories of Migra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6. pp. 181 - 216; Alejandro Portes, Jozsef Borocz,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Its Determinants and Modes of Incorporation, In Robin Cohen (eds), *Theories of Migrati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96, pp. 157 - 180.
- [36] Michael S. Teitelbaum,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vol. VIII issues 2, 2002, pp. 157 - 167.

- [38] Douglas S. Massey,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Africa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June 4 - 7, 2003.
- [39] Philip L. Martin, *Sustainable Migration Policie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nternational*, Geneva,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2003.
-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 人民出版社, 1963年, 第618 - 619页; 参见丘立本:《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问题刍议》,《从世界看华人》, 南岛出版社, 2000年, 第1 - 15页。
- [41] Philip L. Martin, *Sustainable Migration Policies in a Globalizing World International*, Geneva,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2003.
- [42] 景学成、阿提莱·斯迪文斯、吉米·克莱克:《八论 世界经济发展宣言 (草案)》, <http://www.investchina.com.ch/market/jjifzxy/396335.htm>
- [43] 张维庆:《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人口》,《求实》2004年第7期; 张翼:《中国人口还要继续增长30年》, 人民网, 2003-08-26。
- [44] Douglas S. Massey, Patterns and Proces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Paper prepared for Conference on African Migr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hannesburg, June 2003, pp. 18, 41.
- [45] Henrik Olesen, *Migration Return and Development: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2002, p. 11.
- [47] Peter S. Li, *Chinese Overseas as a Minority in Majority Settings*, Proceedings II: the 4<sup>th</sup> International Chinese Overseas Conference, 2001, Taipei pp. 19 - 40.
- [48] Colin Clarke et al. (eds), *South Asian Diaspora: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0, p. 1.
- [49] <http://www.Ireland-Information.Com>, *Ireland in the World-The Irish Abroad?* 2000.
- [50] Rudolph J. Vecoli, The Italian Diaspora 1876 - 1976 In Robin Cohen (eds), *The Cambridge Survey of World Mig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14 - 122; 王彦林:《意大利》,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6年, 第35 - 36页。
- [51] Michael Heffernan, French Colonial Migration. In Robin Cohen (ed.) *The Cambridge Survey of World Mig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8.
- [52]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Replacement Migration: Is it A Solution to Declining and Ageing Populations?* 2000.
- [53] 欧阳逸民:《人口减少愁坏俄罗斯》, 人民网, 2002-09-19。
- [54] 许丹松:《从认识误区开始——探索我国对外劳务合作管理的新路》,《国际贸易》1999年第11期。
- [55] Ronald Skeldon, Myths and Realities of Chinese Irregular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Migration Research Series*. No. 1, 2000.
- [56] 王秋瑞:《WTO国际移民法律规范初探》,《时代潮》2004年第11期。
- [57] 参见丘立本:《从国际移民角度研究华侨华人问题》,《侨务工作研究》2004年第3期。
- [58] 丘立本:《国际人口迁移与华侨华人研究》, 载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